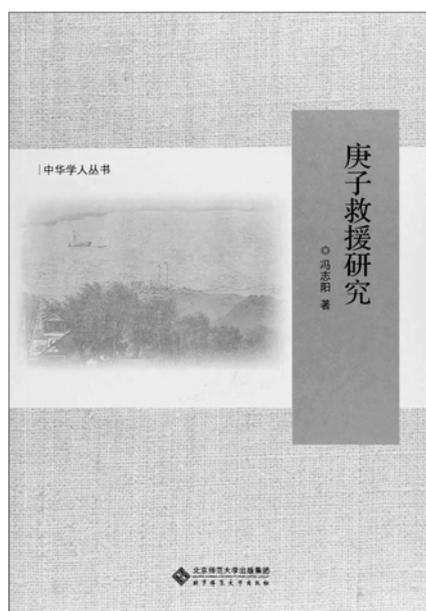


從「事件史」到「事件路徑史」的探索

——評馮志陽《庚子救援研究》

● 馬金生

通過對史料的挖掘整理，作者全面詳細地揭示了一個學界少有人知的歷史事件，那就是庚子國變期間，身處上海的東南紳商曾經掀起了一場針對京津難官難民的重大救援行動。



馮志陽：《庚子救援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如果提起一百二十年前的那個庚子年在中國歷史上發生了甚麼重大事件，相信不少國人會不約而同地想到八國聯軍侵佔北京。在這千年未有的歷史變局中，慈禧太后和

光緒皇帝倉皇「西狩」，扔下了一副爛攤子等着臣下收拾和打理。除此之外，人們很少會去想：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在這座帝國都城中發生了甚麼樣的歷史故事？群龍無首的官員如何面對這場國難？他們如何去求取生存？內心深處又有着怎樣的所思所想？對於陷入國難中的京城官員和百姓，其他省份的官紳士商又有哪些認識和作為？如此等等，任何一個問題都使人們既覺得有趣，同時又感到茫然沒有頭緒。

2018年，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馮志陽博士出版了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史學著作《庚子救援研究》（引用只註頁碼）。在這部書稿中，作者試圖回答上述問題。通過對史料的挖掘整理，作者全面詳細地揭示了一個學界少有人知的歷史事件，那就是庚子國變期間，身處上海的東南紳商曾經掀起了一場針對京津難官難民的重大救援行動。在這場持續了近半年的救援行動中，東南紳商

不辭辛勞籌措經費、運輸糧食，甚至不惜以身犯險，親自從上海奔赴京津實施救援。為了呈現相關歷史事實，作者於各種史料中沉潛往復、考訂求索，歷時達五年之久。最後完成的書稿洋洋灑灑四十餘萬言，是一部相當扎實且厚重的學術著作，顯然值得認真研讀和推介。

一 庚子救援研究緣何長期未受重視？

義和團運動史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史學研究「五朵金花」之一的「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史」範疇，一度是史學研究的熱門領域。自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內相關研究已非常成熟，學術成果頗為宏富。有學者統計，從1950到2012年，國內關於義和團運動史的研究論文和文章應不少於2,300篇^①。相關研究論著、論文集和小冊子等，恐怕也在百部以上。對於一名博士生而言，想從義和團運動史中尋找論文選題，顯然並非易事。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馮志陽在這塊開墾殆盡的土地中竟然發現了一塊「處女地」。歷經五年辛勤耕耘後，最終收穫了令人眼前一亮的研究果實。捧讀本書之際，最讓筆者感興趣的是，對於庚子救援這樣重要的歷史事件，緣何在學界長期受到忽視或者冷遇？易言之，作者為何能夠在現有研究的阡陌縱橫中獨闢蹊徑，發現了這一「礦藏」？筆者認為，相關原因或可從如下三個方面加以尋找：

首先，與晚近以來史學研究理念的轉變有關。自二十世紀末特別

是二十一世紀以來，新文化史在中國大陸蓬勃發展，吸引了諸多青年學子加盟其中。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摒棄了原有的宏大歷史敘事模式，有關研究「從圍繞人的環境轉向關注環境中的人」，「關注的對象從群體轉向個人」^②。在相關史學理念的轉變下，研究者開始從底層視角對歷史進行重新審視，從而使以往為學界所忽視的諸多問題受到重視。

儘管馮志陽在書中並未明言自己的史學寫作受到新文化史的影響，但其所秉持的學術理念，卻有着非常清晰的體現。作者在第一章指出，以往關於庚子國變的研究，往往關注義和團運動的起源、過程、性質和意義，以及義和團與清政府、外國侵略者之間的關係等宏大議題，而「對於這場運動中具體歷史人物的命運較少關注」。即使一些研究有所注意，相關成果也主要聚焦在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榮祿、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重要歷史人物身上，重點討論他們在這場鉅變中的歷史作用和影響，但對於這些人物本身的命運並不關心，對他們在庚子國變中「或彷徨、或憤怒、或掙扎、或得意、或憂懼、或無奈」的心境更是無從着墨（頁23）。作者更進一步指出，本章主要關注那些「被動承受這個歷史過程的普通京官」，關注他們「坐困愁城的日常生活狀態，包括他們的所作所為和所思所想」（頁24-25）。不難看出，作者針對既往研究中的不足，將關注重心放到了少為人關注的京官群體身上，將他們作為實實在在的「人」加以考察，關注他

作者針對既往庚子國變研究中的不足，將關注重心放到了少為人關注的京官群體身上，將他們作為實實在在的「人」加以考察，關注他們被拖進歷史泥淖中的困頓和掙扎等歷史諸面相。相關理念非常清晰地詮釋着新文化史的潛在影響和印記。

作者不僅要關注救援者如何施救，也關注被救援者的日常生活實態。京官群體留下的日記、筆記、書簡等，不僅有着對於自身處境的真實記錄，同時亦有着對於時局發展的觀察、評論和揣度等「廟堂之思」以及相關實踐，成為作者走進歷史現場的最佳切口。

們被拖進歷史泥淖中的困頓和掙扎等歷史諸面相。相關理念非常清晰地詮釋着新文化史的潛在影響和印記。

其次，與研究的角度或問題意識有關。以往關於庚子救援的研究，更多是將其納入救災史或慈善史的範疇內加以考察。庚子救援本身被當作了「背景板」，學者並沒有給予太多的關注。對此，作者在書中也有所交代。如其所援引、討論的李文海、朱澍、池子華等學者的研究，儘管對庚子救援有所論及，但其核心的問題意識並不在這一歷史事件本身，而是或在於考察晚清義賑的特點及其演變、或在於藉由這一事件探討如何超越舊有地方史研究的路徑局限、或在於討論庚子救援中的西方慈善因素及其對後世紅十字會建立的影響，等等。

與上述有着獨特的問題意識的研究取向不同，馮志陽的研究意圖非常簡單。用作者自己的話說，現有研究「缺乏對於庚子救援事件本身來龍去脈的細緻考察，而這正是本書所欲解決的最主要的問題」（頁7，註釋1）。因此，作者的研究不僅要關注救援者如何施救，也自然而然地關注被救援者的日常生活實態。京官群體留下的日記、筆記、書簡等資料，不僅有着對於自身處境的真實記錄，同時亦有着對於時局發展的觀察、評論和揣度等「廟堂之思」以及相關實踐，從而成為了作者走進歷史現場的最佳切口。在以往的義和團運動史研究中，這些常常被視而不見的史料因而具有了重要的史學價值。

最後，庚子救援史料的性質和分布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相關研究的廣泛開展。如上所述，庚子救援活動往往只有研究救災史或慈善史的學者才會關注。同時，實施救援活動的主體主要是生活在上海的富商大賈，這一群體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徵。庚子救援活動的主要史料如中國救濟善會發起人陸樹藩的《救濟日記》、《救濟文牘》主要藏諸於上海圖書館，其他資料多分散在上海的《申報》、《中外日報》等晚清報刊中。爬梳、整理並考訂相關史料的真偽，需要有足夠的耐心和定力，同時也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周武：〈序〉，頁3），於此足可見相關史料的性質及其零散性的分布特徵，也使相關研究並不易引起注意。

二 「事件史」路徑下對庚子救援的揭示

從共和國成立七十年來、尤其是1977年以後的義和團運動史研究學術脈絡來看，「事件史」一直是一種主要的研究理路^③。所謂「事件史」就是對歷史事件本身的起因、過程和結果的來龍去脈，即始末緣由的考察和梳理。本書所秉持的正是「事件史」的研究理念。正如作者在導論中強調，本書首先將這次救援行動「視為一次事件，有開始有結束，有施救者有被救者，有詳細的救援過程，有豐富的救援細節，即盡量完整地呈現這次救援事件本身，是本書最為着力的地方」

(頁6-7)。很顯然，對於庚子救援的着力挖掘和呈現是本書的重要任務。全書除導論、餘論、附錄、後記外，共分六章。謀篇布局基本按照庚子國變的發生以及庚子救援的緣起、經過和結局而設置。

第一章主要通過高栢、惲毓鼎、葉昌熾等留守京官以及齊如山、仲芳氏等事件親歷者的日記、筆記、詩詞、回憶錄等資料，勾勒並還原出義和團運動高潮期間與八國聯軍入侵下的北京城的基本面貌。八國聯軍逼近北京，迫使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帶領極少數親貴倉皇西逃，留下一座「無主之城」。原本的統治權威讓位於分區佔領的聯軍的武力統轄，都城社會秩序陷入一片混亂和暴力之中。洋兵和使館人員帶頭劫掠京城中皇室、達官顯貴和商行鋪戶的財富，此外更有京城莠民連番洗劫。對於這次國難，有些官員選擇了殉國；有些則抱團取暖，並試圖與清朝中樞建立聯繫；有的官員則試圖和聯軍進行溝通，希望盡快恢復社會秩序；更多的普通京官忍辱偷生，生活在乏糧缺俸的環境之中，惶惶不可終日。

第二章同樣是利用京官的日記等資料，討論了庚子國變期間部分京官和難民想盡辦法逃離北京，但海路、陸路交通線的隔斷，使得逃難的花費與風險在無形中提高和加大，一些官員和平民南逃不久，便由於各種原因不得不折返北京。那些既無條件逃離北京、又無俸祿養家的京官，立時陷入生活困頓之中。與此同時，作者通過幾經周折後返回南方的幾位逃難人士的記

述，對逃難沿途的悲慘情景進行了鋪陳。此外，在南北通信斷絕的情況下，《中外日報》、《申報》、《新聞報》等滬上報刊對於庚子國變進行了事無鉅細的系列報導，其中不免夾雜着道聽途說的謠言和由此而來的「南方對北方亂象的了解與想像」（頁14），更加重了東南官紳商民對於北方親友悲慘境遇的擔心和憂慮，而正是這種心態促成了庚子救援行動的發端及其在東南社會的一呼百應。

自第三章起，作者的論述切入到本書的核心部分。通過綜合利用陸樹藩的《救濟日記》、《救濟文牘》，盛宣懷檔案資料，以及《申報》、《中外日報》和《新聞報》中所刊載的各種有關救援的公函、電報、捐款清單、載回被災官民名單、有關善會組織的雜記等資料，作者試圖還原中國救濟善會和濟急善局的成立過程，並對兩大善會組織的發起人、公啟、章程以及分工進行了詳細解讀。作者在該章中特別強調，濟急善局在救援對象上經歷了一個從局限於江浙人民擴展到東南各省的過程，體現了庚子救援行動確實反映東南各省寓滬官紳士商的共同意願。

第四章重點討論了善會組織對京官的救援，以及濟急善局擴充為東南濟急善會的過程。相關救援方式包括打通南北之間的匯款渠道、護送受難官商南下，以及籌劃從南方向北方運送棉衣、糧食等物資。作者也通過對粵籍紳商對粵籍京官的救濟以及對東南濟急善會匯款救濟京官的相關方式（公濟、指濟、

通過綜合利用陸樹藩的《救濟日記》、《救濟文牘》，盛宣懷檔案資料，以及《申報》、《中外日報》和《新聞報》中刊載的各種有關救援的資料，作者試圖還原中國救濟善會和濟急善局的成立過程，並對兩大善會組織進行詳細解讀。

自二十一世紀以來，義和團運動史的研究愈來愈呈現出從「事件史」轉向「事件路徑史」的新趨勢。作者強調庚子救援行動「就發生在這樣一個具體的日常世界中，並為各種各樣的因素所制約」，相關認知與「事件路徑史」的研究思路是完全契合的。

專濟)的詳細分析，指出庚子救援行動是一場以「鄉誼」為基礎的救援行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論述了李鴻章號召各省封疆大吏捐款接濟京津難官難民，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以三人名義謀劃組織留守京官奔赴西安行在，以及慶親王奕劻致電要求在旗督撫接濟京城旗人等有關救援活動情形，展現了這些清廷重臣和疆吏領袖在庚子救援過程中的多重面相和微妙心態。

在第五章中，作者重點討論了救援活動裏華洋官紳之間的互動關係。在救援活動中，中國救濟善會與東南濟急善會之間頻繁聯絡，互通聲氣。此外，陸樹藩在帶領中國救濟善會會員北上救援途中，通過巧妙標榜「紅十字」理念、申請「德領事」護照、聘請德國醫官等形式與洋人交涉，逐漸在洋兵遍地的京津地區為救援活動營造了較為有利的局面。作者敏銳地指出，陸樹藩與李鴻章的緊密聯繫，不僅有利於自抬身價，同時也為中國救濟善會在東南官紳士商中贏得了更多信任和資源。此外，作者專門討論了劉鄂購買太倉粟救濟難民一事，指出劉鄂以紳士身份從洋兵手中購米平糶，跨越了官紳之間權力的邊界，這卻成為其最後獲罪流放的罪名之一，折射出清末官紳間關係的緊張和衝突。

第六章的討論圍繞着救援活動的終結。辛丑年(1901年)4月，中國救濟善會、東南濟急善會運送「浙江三忠」(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的靈柩回到南方，並在上海舉行了隆重的祭奠儀式，標誌着救援

行動的結束。隨着2月、3月間京城社會秩序的恢復，救援活動已失去客觀的必要。與此同時，由於花費巨大，東南濟急善會和中國救濟善會也存在着資金緊缺、內部矛盾加大等一系列問題，這也成為了結束救援行動的主觀原因。

《庚子救援研究》一書史料扎實、考證嚴密、引述廣泛、敘述流暢，給人以厚重、綿密之感。特別是由於義和團運動史研究的相對成熟，作者在有關章節的討論中時常與現有研究進行對話。如關於義和團和八國聯軍帶給北京城的混亂、劫掠與破壞，學界有着不同側重的描述。但是，北京城的混亂局面始於何時，因何而致，以及義和團全盛時期北京城的混亂和八國聯軍佔領時期的混亂有無區別、區別何在，原因又何在等等問題，現有研究多語焉不詳。對此，作者在本書第一章中對這些問題進行了細緻梳理和探討。相關討論或對現有研究形成補充，或進行質疑，或直接否定，讀來頗有酣暢淋漓之感。在充分體現作者對現有研究有熟悉了解的同時，也將相關研究多所推進。

三 「事件路徑史」下的多方探索

自二十一世紀以來，義和團運動史的研究愈來愈呈現出從「事件史」轉向「事件路徑史」的新趨勢。所謂「事件路徑」，是「一種通過微觀探討宏觀、借助事件考察結構、分析與敘事並重、靜態與動態兼顧

的研究路徑」。相關研究的「關注對象從事件本身轉向了事件背後的社會制度、關係和結構」，「它不再把歷史事件視為自足的研究對象，在歷時性的事件過程考察之外，將相對而言更具穩定性的共時性社會結構……納入研究視野」，「其意義更多地在於對深層、隱蔽的社會歷史真相的反映」④。作者明確指出，本書「還有甚麼企圖的話，那就是希望通過呈現庚子救援事件的來龍去脈，見葉知秋，即感受和體會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日常中國及其變化」，並強調庚子救援行動「就發生在這樣一個具體的日常世界中，並為各種各樣的因素所制約」（頁8）。可見，作者的相關認知與「事件路徑史」的研究思路是完全契合的。通過對庚子救援的探究，作者將晚清社會諸多隱而不彰的重要歷史面相進行了生動揭示。在本書餘論部分，作者對此以「絲業」、「京官」等「關鍵詞」的形式進行了高度總結。

筆者認為，本書最值得稱許的應是作者對十九世紀下半葉絲業發展和絲商群體的有力揭示。通過對善會組織的研究，作者發現中國救濟善會的發起人陸樹藩、濟急善局五位發起人中的龐元濟和施則敬，以及協濟善會的重要發起人楊兆鼐均為絲商（頁117、153）。作者順藤摸瓜，進而發現這些絲商多出身於江浙地區，而絲業在十九世紀中後期的江浙地區，特別在浙江湖州地區是最為顯赫的行業。

1887年，蠶絲的出口總值超過茶葉，成為中國最主要的出口

物；1898年，蠶絲的出口總值已是茶葉的兩倍。上海開埠後，成為絲業出口的中心。從咸豐年間開始，上海的絲業出口逐年上升，佔全國90%以上的份額。絲業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上海經濟活動中具有宰制性的作用，就如茶業貿易培育出粵東買辦群體一樣，絲業貿易則催生出江浙買辦群體。積累起巨大財富的江浙絲商，不僅在上海擁有舉足輕重的社會經濟地位，同時利用其手中的資源，同江南義賑等慈善活動建立起非常密切的聯繫。作者據此指出，江浙絲商群體的崛興是中國近代經濟史上的重要現象之一，可惜並未受到學界足夠的重視（頁303-11）。作者對晚清絲業發展狀況的梳理，不僅增加了人們對晚清上海和江南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脈動中重要但不為人知的歷史面相的認識，同時也為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探索出新的空間。

此外，在以往有關庚子國變的研究中，很少有人論及晚清交通業、通訊業發展與庚子國變的關係，從事史學研究的學者一般對晚清的交通和通訊史也了解不多。作者在對庚子救援的討論中，着力對晚清海陸運輸和電報局的發展進行了專門探究。在作者的呈現下，讀者可知海路運輸在晚清南北交通中已經突破了傳統的運河運輸形式，不僅大宗貨物以海運為主，人員往來也逐漸轉向海路。與此同時，意圖貫穿南北的蘆（台）漢（口）鐵路在庚子國變前已完成了蘆（台）保（定）段的建設，並通車運行。連接京津的（天）津蘆（台）鐵路也已完工，庚子國

作者指出，江浙絲商群體的崛興是中國近代經濟史上的重要現象之一，可惜並未受到學界足夠的重視。此外，以往很少有人論及晚清交通業、通訊業發展與庚子國變的關係。作者在對庚子救援的討論中，着力對晚清海陸運輸和電報局的發展進行了專門探究。

晚清影響深遠的省籍、省界意識的凸顯，如若尋根溯源，無不指向庚子年間。通過對出身於南方的京官日記的解讀和對善會救援行動的考察，作者發現無論是京官還是南方的士商，都有着明顯的南北意識和東南意識。

變前的官紳士商主要依靠鐵路往返於京津之間（頁64-65）。

在庚子年前，清政府的電報通信網絡建設也頗有起色。以北京為中心，清政府對外聯繫的電報線有三條，分別是「北京—通州—天津—上海」的「東線」、「北京—保定—太原—西安」的「西線」，以及「北京—張家口—庫倫—恰克圖」的「京恰線」（頁92）。作者依據相關史料對交通和電報線路在庚子國變期間如何遭到破壞進行了梳理和呈現，實現了其「觀常知變」的研究目的（頁5）。相關討論生動地還原了人們在交通線路阻斷後，資訊不通暢時茫然無措、焦慮無助的歷史場景。對於今天身處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中的讀者來說，更容易產生一種情緒上的共震效應。

再如省籍意識、東南意識和南北意識，也是作者在考察庚子救援時努力呈現的重要概念。作者指出，晚清影響深遠的省籍、省界意識的凸顯，如若尋根溯源，無不指向庚子年間。通過對出身於南方的京官日記的解讀和對善會救援行動的考察，作者發現無論是京官還是南方的士商，都有着明顯的南北意識和東南意識。而東南意識的萌發，作者認為除了學界指出的東南地區係中西文化交匯區域外，更與上海在開埠後成為中外貿易中心有關。全國各省特別是東南各省的商幫都在上海建立了會館、公所等組織，在日常生活中，各商幫的活動以省籍、地區為中心而展開，這對於省籍意識的萌發和發展影響深遠。

不過，上述意識在庚子國變以前儘管存在，卻一直「潛而不彰」。正是庚子國變中以省籍意識為底色的救援行動，不僅使省籍意識得到強調，同時相關行動「反過來也大大推動了『省籍』意識的高漲，讓以往潛而不彰的『省籍』意識浮出水面，成為清末新政時期『省』意識或『省界』意識勃發的前奏」（頁325-31）。相關討論層層遞進，大大推動了學界在相關研究上的認知。

作者在餘論中還對義賑與上海華人社會的整合、晚清華洋官紳之間的關係等進行了討論。限於篇幅，筆者不擬再展開論述。總之，正如本書導論中所說，為了更好地敘述和了解庚子救援，作者「不得不進入這個救援事件發生時的具體時空情境中，深入探討庚子國變前後南北間交通方式與通信方式的變化、京城社會管理方式的變化、京官日常生活的變化等，此外還包括江南社會的義賑傳統，中外貿易與江浙絲商群體在19世紀下半葉對於上海乃至江南經濟的宰制性影響，京官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角色，以及華洋之間、官紳之間的微妙關係等，這些共同構成了與庚子救援事件直接相關的歷史情境」。作者坦承，對於上述任何一項的研究，都不會比庚子救援本身更為簡單，因此他將「相當多的精力都花在構建支撐庚子救援事件得以發生的地基上」（頁8）。作者所說的「地基」，其實就是「事件路徑史」所要揭示的事件背後的社會結構因素。從本書的相關實踐來看，作者亦很好地實現了這一研究構想。

四 值得進一步挖掘之處

如上所述，作者「觀常知變」的討論對於我們了解庚子救援具有積極的意義。作者為展現庚子救援而辛勤築造「地基」的理念和努力，不僅有利於為庚子救援的發生、發展搭建豐富的歷史背景，並將其納入晚清的歷史脈絡中進行「瞻前顧後」的考察，同時也有利於人們更加立體地認識晚清社會的發展狀況。按照「事件路徑史」的研究理路，在「觀常知變」的同時更要「觀變知常」，即通過偶然事件的研究反觀事件背後的社會結構因素。「觀常知變」、「觀變知常」相輔相成，對於人們認識晚清的時局和世相更有意義。在通讀全書後，在「事件路徑史」研究理念的貫徹上，筆者認為還有一些空間需待作者繼續探索。

首先，對於庚子救援中相關捐款和匯款的具體款項數量缺乏統計及相應的深入分析。如作者所揣度，由於匯解至京的救濟款項或許存在着被挪用或者貪佔的可能，同時《申報》登載有關救援款項的資訊存有語焉不詳或信息嚴重不足等情形，因此不太可能對救濟款項進行準確的統計與核實。作者基於此放棄了對有關款項進行統計，也自認為「這也成為本書的一大遺憾」（頁20-22）。缺乏相關款項的數據統計確實非常可惜，因為這是人們了解庚子救援全貌最為直觀的依據。其實，在作者擬定的本書附錄〈庚子救援大事紀〉中，便有不少東南士紳商民和各省督撫的捐款數字，以及東南濟急善會和中國救濟善會的

匯款數字。如對此進行初步的統計，便能夠比較直觀而全面地呈現出此次救援行動中各省具體的捐款、匯款情形，並在此基礎上分析出捐款、匯款主要集中在哪些省份和哪些群體，由此則可以獲悉上海的影響力在晚清中國的具體輻射範圍及其程度，至少比完全缺乏相關統計要好很多。

其次，對於庚子國變前京官群體的日常生活亦缺乏足夠的關注和剖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討論的深度。京官的生活為何在庚子國變中會首當其衝受到影響？原因除了作者所揭示的京官是各省利益在中央的代表外，其實還與普通京官不同於大權在握的地方督撫，日常生活比較拮据有關。作者引用的劉鄂致陸樹藩信函中，便有對京官日常生活的描述，「京官苦況，平時且不免支絀，當此大難猝興，走則無資，留則無食」（頁157），即是一般京官生活的真實寫照。比如曾國藩在做京官期間，常靠饋贈和借貸維持生計，其微薄的俸祿根本不能貼補家用，直到外放後才有餘錢將京官生涯的欠賬還清^⑤。對於京官的拮据，清王朝的統治者並不是不清楚，因此並不禁止各省地方官對京官的「冰敬」、「炭敬」，使相關行為成為了一種定例（頁314）。如果作者在討論中對承平時期的京官的日常生活多有留意，便會使有關討論更為精彩。例如，對晚清時期各省的「冰敬」、「炭敬」的數額作出統計，再將之與庚子救援中各省的捐款數額加以比對，相信會更加有利於了解庚子救援的性質與特

本書對於庚子國變前京官群體的日常生活缺乏足夠的關注和剖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討論的深度。對於國人的華洋意識也缺乏必要的討論。比如在論述庚子國變時談到很多京官都多少流露出對義和團的不認同，但卻並沒有論及京官對於侵佔北京城的聯軍的態度。

本書嘗試進行的從「事件史」向「事件路徑史」進行開拓的努力尤其值得稱道。書中所發現的中國近代絲業發展、省籍省界認同、華洋官紳關係等課題，都為作者的後續研究準備了足夠的空間。

徵。對於京官日常生活的研究，學界已有不少討論，本書也曾有所徵引，可惜並未給予足夠關注。如果對京官的生活狀況有着更為詳細的了解和介紹，相信會更有利於增加讀者對這場救援活動重要性的理解，同時也更能夠看出晚清世相中的「常」。

再次，本書對於時人的南北意識、省籍意識有着很好的梳理，但對於國人的華洋意識卻缺乏必要的討論。比如在論述庚子國變時談到很多京官都多少流露出對義和團的不認同，但卻並沒有論及京官對於侵佔北京城的聯軍的態度。作者並未對京官日記中的相關內容進行分析解讀，而在處理東南諸省的官紳士商對庚子國變的態度時，也沒有論及他們對八國聯軍的態度。須知八國聯軍攻佔北京這一事件本身，不可能不讓官紳士商產生家國之痛、山河之悲。同樣，以陸樹藩為首的東南地區紳商巨賈不惜欠下巨額賬務也要拯救受難京官和難民於水火（頁119-31），相關行為又當如何來進行解釋？恐怕僅以相關行動能夠提升其社會地位等加以詮釋，解釋力還遠遠不夠。陸樹藩等人在庚子救援中近乎毀家紓難式的作為，與其宗教信仰、家國情懷和國家大義應有着一定的關聯。如若對東南士商的華洋意識進行梳理的話，相信對於呈現晚清國人的國族認同和國族意識將會有所助益。

當然，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說，庚子救援研究牽扯的面向太寬、太廣，因此，在謀篇布局中必須要審慎地考量。否則，對於任何一個方面的過度討論，都可能會沖淡研究

的重點。在此，筆者只是提出了有關研究進一步深化的可能。

五 小結

總而言之，《庚子救援研究》一書是一部嘉惠學林的厚重之作。特別是本書嘗試進行的從「事件史」向「事件路徑史」進行開拓的努力尤其值得稱道。相關研究也再次表明，「事件路徑史」研究對於進一步深化義和團運動史研究頗具積極意義。書中所發現的中國近代絲業發展、省籍省界認同、華洋官紳關係等課題，都為作者的後續研究準備了足夠的空間。在此也期待作者在這一領域繼續深入耕耘，以便將來有更多的優秀史著貢獻於學林。

註釋

- ①③ 崔志海：〈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國內義和團運動史研究〉，《史學月刊》，2014年第9期，頁5-10；7-9。
- ② 李霞、楊豫：〈走向開放的綜合：新文化史學探析〉，《國外社會科學》，2001年第5期，頁30。
- ④ 李里峰：〈從「事件史」到「事件路徑」的歷史——兼論《歷史研究》兩組義和團研究論文〉，《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頁147、148、153。
- ⑤ 張宏杰：〈以曾國藩為視角觀察清代京官的經濟生活〉，《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4期，頁126、127、130。

馬金生 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